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7.03.005

湖南作家作品研究·《国画》专辑 主持人:北京大学博士后唐伟

[主持人语]随着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热播,各种“名义”的话题层出不穷,不仅小说原著畅销不止,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所谓“官场小说”热也重回人们的视野——毋宁说作为小说的《人民的名义》,其实就处在“官场小说”的历史延长线上。有意味的是,无论是对今天《人民的名义》来说,还是就当年作为所谓“官场小说”翘楚之作的《国画》而言,批评界的应对表现,其实让包括作家在内的一干读者大失所望:批评家们除了以一种陈腐的“纯文学”傲慢地做那种简单的“是”与“非”界定外,顶多也就是在所谓“官场小说”“反腐小说”“政治小说”或“政治文化小说”等形名之辨上纠缠不清。这两类批评,要么是流于趣味偏见的隔靴搔痒,要么是以批评术语来转译复制小说的故事内容,停留在那种低水平的“反映论”上,穿透文本的阐释能力相当匮乏和有限;而即便是那种网开一面的冠之小说以“现实主义力作”的美誉,怎样的“现实”也是大而化之的含糊其辞。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专栏,试图以王跃文的《国画》为例,回到“历史”源头,抛弃各种“名义”或“主义”之见,重新勘探此类触及市场“爆点”的小说是怎样深刻“再现”并“介入”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现实的,以期为解读这类小说提供新的视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小说艺术

——以王跃文的《国画》为例

唐 伟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市场经济”的特色表述,也高度表征了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特点,毋宁说这一涵容了国家(政党)、社会、市场三个层面的综合言说装置,其从形式上看,正是中国模式或中国政制的代名词。王跃文创作于1998年的《国画》,以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敏锐地回应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建制,共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结构。《国画》的“真实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只有从小说完美隐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镜像的层面才能得以澄清。

[关键词]《国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式主义;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7)03-0023-09

Novel Ar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aking Wang Yuewen’s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as an Example

TANG W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not only a characteristic expression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but also a high refining and concentration of the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a. It contains the integrated speech devices at the three levels of the state (political party), society and market, which is formally

收稿日期:2016-12-15

作者简介:唐 伟(1983-),男,湖南东安人,北京大学博士后,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synonymous with the Chinese model or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Wang Yuewen's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which was created in 1998, has responded to the historical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by the art form of novels and shares the spiri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true and profound reflection of social real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can only be clarified from the mirror image of the perfect metapho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formalism; realism

湖南作家王跃文因小说《国画》的一纸风行而声名鹊起,一度被坊间誉为“官场小说第一人”。尽管王跃文本人不太情愿领受这一带有“炒作意味”的名号,但自《国画》之后,当代文坛以官场为题材的小说跟风效仿、盛极一时却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一意义上说,“官场小说”的命名与其说是一种风格题材定位,倒不如说是一种邀约召唤。对王跃文及其《国画》来说,尴尬之处在于,小说持续至今的畅销,让作家有了可观的经济收入(王跃文曾以435万的年收入位列2007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第9位),但学院派批评有意无意将《国画》打入一开始就预设了文学审美等级的“官场小说”另册:“官场小说大多仅具新闻性和社会信息功能,审美含量和艺术贡献极度匮乏。”^[1]“官场小说”的命名,事实上是将《国画》排除在了传统意义的严肃创作之外,而市场的热捧,似乎又反过来成了《国画》“非文学性”的某种印证。

专业批评家认定《国画》为俗套的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上并不足观,其官场题材投机而轻浮;而喜欢《国画》的大众读者,则认为小说真实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以至于很多年轻人把它当成社会生存秘籍或官场入门手册,“他们大学或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老师郑重建议他们读《国画》”。^[2]⁵²⁶大众读者与专业评论者的态度呈现如此大的反差,这本身就值得玩味。

而笔者感兴趣的,并非是作家自称“这是一部孤愤之书,也是一部忧患之书”的辩解,也不是“学院”与“民间”的隔阂。若依当下“官场小说”的概念设定而言,《国画》显然不算是“第一部官场小说”,在此之前柯云路的《新星》、刘震云的《单位》《官场》《官人》等,都是以官场为背景的当代小说。但为什么偏偏是《国画》引起轰动且获得了“官场小说”之名?如果说“官场小说”真有一定的指示意义,那么“官场小说”的“官场”是如何在小说中被塑形的呢?换言之,重要的不是从所谓人性角度考察官场权力游戏规则的运用,而应当探问官场规则是如何被规定的,即人性究竟在怎样的官场条件下成为可能的。进一步的问题,如果说《国画》较之

前的改革文学或以政府机关为背景的小说有很大不同,那么这种区别是落实在小说的表现重心上还是时代背景上呢?如果说决定性的因素是“讲述故事的年代”而非“故事讲述的年代”,那么,小说创作完成的20世纪90年代末(1998年),究竟有何特殊性?

但奇怪的是,我们看到,一方面《国画》的故事时间始终语焉不详,小说唯一的时间标识,是作者在小说结尾处标明了成书的年份与地点:1998年11月于长沙韭菜园(笔者手头的版本则是出版之后12年之后的重新修订版。如果将故事时间与小说成书时间看成大致同步的话,那么朱怀镜的故事也应当是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但另一方面,小说持续至今的畅销依据,又恰在于通常认为小说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当下包括官场在内的中国社会现实(“当下”是指从发表之初一直延续到十多年后的今天)。那么,小说故事时间不详,为何却丝毫不妨碍我们将小说与现实进行对接并认定前者就是后者的真实反映呢?小说究竟在何种真实、何种现实上达到了艺术与生活的高度统一?换言之,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来评断小说的现实主义色彩呢?

就小说呈现的社会现实或成书年代而言,90年代是大约可以锚定的历史事实。讲述90年代,我们不可能绕开“市场经济”的叙事。众所周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一直都被视为最重要的文学外部环境诱因,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当代文学的创作,事实上也构成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视角,几乎所有的研究叙事基本上都是围绕“市场”“经济”“商品”“消费”“欲望”等来展开的,但“市场经济”是如何嵌入文学内部制约小说的结构生成与精神限度,似乎并未被恰当地提出来。但这还不是最紧要的,最关键的忽略则在于,对当代文学及其研究界而言,“市场经济”的这一文学外部条件指认,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严重的偏差,即有意无意地漠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构想的特殊限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缩减为“市场经济”,将“市场经济”直接等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本文以小说《国画》为例,将试图从文学研究的

角度阐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社会主义”的有意漠视或无意缩减,严重遮蔽了90年代的社会现实,大大简化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就小说“反映”现实角度而言,《国画》的艺术成就和重要性,也并未得以还原显现。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规划到修辞,到一种政制

众所周知,发轫于9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设想,将“市场经济”由一个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转化成了社会主义内部调整的“经济问题”,其间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历史过程。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推进,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共产党决定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如何发展经济、发展什么样的经济仍未有一个明确的共识。所以我们看到,直到90年代初,那种认为计划与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标志的主张,“在1991年4~11月间受到了有组织的批判”。^[3]1992年1月,邓小平南下广东深圳等地视察工作,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为历史提供了转机。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4]³⁷⁰我们看到,80年代初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在此进一步得到确认。而更重要的则在于,关于如何改革开放、怎样发展经济,邓小平给出了明确的方向指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³⁷³“讲话”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了双重的松绑释义,从而在经济层面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实现对接找到了契合点。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很快便明确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紧接着,中国共产党在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从多领域、全方位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个基本框架成为此后经济改革的行动纲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全新表述,终于获得了制度性的认可保证。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提出始末,往往是依据当下的经济建设成就

来确认邓小平当年的英明决断,亦即无一例外地将今天经济成就的取得,简单归结为“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并由此来确立“市场经济”叙事的无尚权威。但问题在于,在官方的正式表述中,从来没单提过“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官方完整正式的表述。

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设想,并非一蹴而就,“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最初的矛盾冲突,远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要复杂激烈得多。而对邓小平来说,“市场经济”的构想意识,早在90年代之前就已成型。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就曾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4]²⁰³事实上,跟“市场经济”的设想一样,邓小平关于何谓“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构想,同样也是在80年代就已初露端倪,而并非90年代才生成定型。邓小平在1986年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就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同年12月,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4]¹⁹⁵由此可见,在80年代甚或更早些时候,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思想其实就已崭露头角。对比邓小平92年的南方讲话与其80年代的论调,我们很容易发现,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基本上是他80年代论述的一个系统加强版。

但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80年代就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既然已经意识到了市场经济只是一种“方法”,且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又暴露无疑,那为什么80年代邓不主张大张旗鼓地搞市场经济?为什么“计划”与“市场”并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划分标志的理论观点在1991年还会受到有组织的批判呢?一言以蔽之,为什么80年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未有机结合到一起?简单说来,这或许与邓小平刚恢复工作尚未取得牢固的党内地位有关。但进一步的困惑仍在于,为什么进入90年代,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国内风向立马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呢?换句话说,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味的邓小平南方讲话,其直接诱因是什么?

众所周知,在1991年年底,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突变。1991年12月25日,前苏联宣布解体,

苏共丢掉了执政权,社会主义政权“变天”,国际社会主义阵营遭受重创。苏联解体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邓小平就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目的地是当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的深圳经济特区。深圳提供的启示在于:一方面,当地经济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牢固稳定,并未受到任何动摇和挑战。可以说,正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社会主义”面临严重危机的国际政治背景下,邓小平亲临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联系国内实际,审时度势,从概念形式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部分调整,对极具国际政治意味的“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一番大胆的经济改装,即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社会主义=国有制+计划经济”的陈旧观念进行了一次改写,才使得“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成功实现联姻。

上述这一简单的勾勒,肯定无法呈现此中关系的错综复杂,但本文的目的并不在此,而旨在说明,恰恰是“社会主义危机”和“深圳经验”为邓小平重新释义“社会主义”提供了绝好的历史契机,从而最终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理论创想浮出水面的历史可能性。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以经济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主要遵循的还是政治的逻辑,而并未完全按经济自身的规律来操作。但仍需指出的是,传统意义的“社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邓小平90年代初对“社会主义”理论构想的重新改造,并非一劳永逸的完成,而不过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而已。但这一“开始”却足以写进史册: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的主要政治遗产,并不在于引进了“市场经济”,而在于他对“社会主义”展开的重新组装和定义,亦即借苏联解体和国内的深圳经验来重释“社会主义”。

我们看到,后来经济学家着力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正是从这一点入手的。1997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过5年历程,陷入某种现实困境,著名经济学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倡者吴敬琏先生上书中央领导人,“当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然而在这项事关全局的工作中,却由于没有完全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受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国有制+计划经济’的陈旧观念的影响而受到阻碍。为了打破这种障碍,有必要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在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把社会主义经济界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

标的市场经济,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而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条件下,只要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有效地防止财产占有的两极分化,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有保证的。”^[5]可见,邓小平当年对“社会主义”的松绑释义,虽然是一项历史性开创举措,但在事关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等重大事项上,后人的胆子和步子还是不敢怎么放开,缺乏改革的胆识和勇气。吴敬琏先生仍是依据邓小平当年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松绑释义,提出国企改革的议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性质的关键,是看共产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这跟邓小平当年的构思路基本相符。

对邓小平来说,若是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二者间做一个选择的话,他看重的向来都是前者而非后者。“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6]如前所述,市场经济对邓小平而言,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他的这一思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贯如此。与此相反的是,对他来说,“社会主义”才是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青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7]我们看到,邓小平巧妙地运用了一种矛盾修辞,或者说策略性地置换了“社会主义”的概念:既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并且必须坚持,那又何来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呢?但有意思的是,恰是这一艺术化的矛盾修辞才最大限度地解放了“社会主义”概念的阐释空间。

20世纪90年代,虽然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邓小平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一定程度上修订了“社会主义”的内容,但这种注入和修订是有原则性的,并未触及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社会主义底线。恰恰相反,邓小平为“社会主义”概念注入“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等新内涵之后,“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长性和丰富性——不仅概念的开放性得到了确认,同时社会主义的底线也得以包裹藏匿起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再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渠道来呈现,而是转由党的基本路线铺垫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只具备

概念肉身或物质外壳的意义,而并不具有质的规定性。但尽管如此,通向党的基本路线的那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前提限定,仍不可或缺。据当年参与《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者回忆,“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且强调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一是,‘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决定》的起草,一开始就是以这两个基本论断为指导来设计各个方面的改革方向和措施的。”^[8]上述论断在这里再次得到印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经济的根本前提。

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会有意无意造成“社会主义”的遗忘。因为经过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化改装,在“市场经济”的层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确有相通之处,若只孤立地限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构造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恰恰形成一个循环的同义互证。邓小平的意义在于,自从他首次大胆对“社会主义”进行理论改造之后,在1992年之后党的若干次重要会议上,“社会主义”就不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静态封闭概念,而毋宁说是一个正在生成的、有着丰富层次感的开放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可以进行不断自我修复、调整(“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对“社会主义”做了新的补充说明)。当然,中国“社会主义”的底线是共产党的领导,这点毋庸置疑。必须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开放的概念结构,并不意味着任何社会主体都可以对之随意阐释,而是只有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才具有进行概念定义的合法性。

我们看到,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试图将市场经济由一个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成功转化为社会主义内部调整的经济问题,但这仍然是以承认社会主义为前提的,换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政治化的经济。或者说,建立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基本问题的其中之一。简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仍需统一到“社会主义”

的宏大总体框架中来。

至此,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总结:发端于90年代初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自起始之日起就有一个严格的政治限定,即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社会资源配置从计划转向市场那么简单。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外在的语境修饰,而是有着严格的内涵规定:它不但指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施推动主体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而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有其事先的约定。只有将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定性纳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理解中来,我们才能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性,才能抵达90年代复杂社会现实真实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被定义,但事实上,经济所承载的功能意义却远不止经济本身那么简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自90年代起,经济逐渐成为中国首要的政治议题,俨然成了一种“非政治的政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新局面。”^[9]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作为“中心任务”的“经济”,事实上成了具有统摄全局的一个决定性环节。而中国90年代初至今以来的历史也的确如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或全委会上,经济议题都是置于政治的问题之前而被摆在前列(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也指出,要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用“市场经济”的经济叙事,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实政治意图,日益卷入到一个愈来愈模糊的经济表象丛林之中;而在孤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中,“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又能与“市场经济”形成互为阐释,由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愈发凸显出它的形式社会主义意味来了——毋宁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成了一种整全的“政制”,正如施特劳所指出,作为共同生活的生活的形式,政制是社会的和生活生活在社会中的方式,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生活形式、生活风格、道德品位、社会形式、国家形式、政府形式以及法律精神。^[10]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主义与《国画》的现实主义

上述略显繁冗的论述,可能暂时偏离了本文的主题,但为了召唤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身,为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装置做一拆解,从而更准确地理解90年代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其实已经是最大限度的精简了。尽管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非常精巧的组装改造,使得“市场经济”有机会参与到前者的叙事中来,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本质内在的抵牾并没有取消,相反,二者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框架中反而愈来愈隐蔽化、精致化,且在某种意义上又构成双重的二律背反:一方面确实让“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有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并且因为经济政治性诉求(GDP政治化考核),促成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当市场经济获得一定发展空间之后,市场经济内部本身的矛盾也被激活(90年代的“市场经济”叙事正是着眼于此),而当其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且具有某种能动的主体性时,必然会沿着自身的逻辑寻求向其它非经济领域的扩张(教育产业化、文化产业化等),甚至是挑战性地尝试突破“社会主义”的边界。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呈现出动荡、芜杂的一面来,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正是从这一层意义上而言的。

从现实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大叙事,生产并导致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变异,即经济政治与政治经济,两者互相媾和,互为补给加强,形成了一套非常稳定严密的社会统治结构——也正是从这意义上说,“社会”的言说,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才显得举步维艰。“经济政治”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不再是天下为公的理想设计,不再是对统治合法性的质询,权力分配也不是按公开、公平、公正的政治原则来运作,而是一种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共享;二是经济本身以非政治的政治形式出场,取代或取消政治本身。政治的经济,意味着以政治为目的经济发展,并不完全取消经济的独立性,而是将市场化的经济纳入到为政治服务的轨道上来——我们看到,GDP生产是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主要政绩指标来看待的,“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不光在党政机关考核干部时如此,社会舆论也是如此。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11]政治为经济提供保障依据,经济为政治提供内在支撑,正是在这一意义

上,我们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有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被排除在这一互动封闭结构之外的文化,则只能作为某种补充性的存在,附着于经济与政治的共谋结构之上。

从1992年算起,到《国画》成书的1998年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恰好走过了6年时间。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伴而行的6年中,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彼此影响,互相支援,“成就”与“矛盾”同行。王跃文的《国画》,正是从小说艺术的层面灵敏地回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制,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叙事一次成功的文学“复写”,完美地隐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镜像。

我们看到,《国画》中不同人物群体的命运,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安排的结果:朱怀镜、皮德求、张天奇、方明远等政府官僚与裴大年、雷拂尘、袁小奇等商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小说中的他们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受益者;而李明溪、曾偃、卜未之等“文化人”则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之外,作为一群边缘化的存在出现在小说中。李明溪的最终结局是不知去向、不知所踪,卜未之老人则无疾而终,而一腔热血的曾偃被逼无奈远走他乡。小说写曾偃离开荆都的时候(曾偃谐音真理)他留给朱怀镜一封信:

我从来就不善于玩,哪怕小时候别人玩游戏,我也是在一旁看热闹。这也许很宿命地决定了我一辈子都只能看别人玩。满世界都在玩,玩权术、玩江湖、玩政治……玩!玩!玩!成功的就是玩家!玩,成了一个很轻薄的字眼,此皆轻薄世风所致。岂止轻薄!我不屑于玩,一本正经的想做些对得住良心的事,却偏偏在别人眼里,我反倒成了不通世事的老顽童。真是滑稽!^{[2]431}

从某种意义上说,“玩”构成《国画》故事脉络的语法核心,小说展示的正是不同人对“玩”的态度以及怎么“玩”的过程——大众读者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从获悉“玩”的秘密角度来指认小说的实用价值的。曾偃这番“玩”的论调,我们在朱怀镜乌县的部下龙文和在荆都共事的同事邓才刚那里,同样有所见识。龙文在朱怀镜面前评价张天奇说,“他任县委书记几年,整个儿是玩江湖”,^{[2]361}张天奇太会演戏了,“他妈的口口声声组织,什么蝇营狗苟的事都可以借组织的名义来做,冠冕堂皇”。^{[2]302}也就是说,“玩”本身是有学问的,并不是谁都可以随便“玩”——李明溪、卜未之的玩赏字画并不在“玩”的框架之内,皮德求、张天奇、朱怀镜等玩弄权术于

股掌,才是真正的“玩”——有意思的是,简体字的“玩”恰好诠释了玩的实质:“王”权与金“元”的组合搭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玩”的辩证法在于:首先是得有“玩”的能力,即要么有权,要么有钱;其次是对有能力、有意愿参与“玩”的人来说,既要有“玩”的目的性默认共识,又要精通“玩”的方法,不能破坏“玩”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来,有两类人自然会被排除在外:一类是想玩却没有玩的能力的,二是有能力却不愿意玩或不屑于玩的。朱怀镜一开始属于前者,他想参与玩的游戏,却苦于没有后台,小说写的就是他如何寻找后台、投靠后台,最终是怎样利用后台参与到玩的游戏过程中来的事。而在此过程中,朱并非完全认同“玩”,也表现出一定的自我反省能力,反映出他“玩”的态度的暧昧性。而曾惺则属于后者,作为一名有职业操守的记者,他先是要曝光乌县的假农资事件,只是由于朱怀镜的友情干涉以及乌县政府对其家人的要挟,才最终妥协。后来,曾惺又要在报上发表鲁夫曝光袁小奇的文章,领导规劝未果,他也最终遭到放逐。小说中会玩、会演戏的人又何止张天奇一个?用小说的原话,《国画》中的人物大多“都是场面上走的人”,包括朱怀镜在内的每个“场面上走的人”都很会玩,连表面看似木讷的私企老板裴大年,朱怀镜后来才意识到他看走了眼,作为商人的裴大年其实相当精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会“玩”的高手。

如上所述,“玩”是“王”权与金“元”的暗通款曲,而这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互勾连的结果。通过前面分析的结论,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支配,并不是在前台直接进行的,而是转为后台隐蔽地操纵。因为市场经济的规律要求,“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支配不可能直接介入,反之亦然,因为社会主义的性质,“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的支援也不能是直接性的。也就是说,“玩”本身必须是艺术化的,而不是没有遮羞布的赤裸裸。

从处世态度上讲,“玩”并不需要真诚,但又需要假装真诚,“这世界,没有真诚的却在假扮真诚,有真诚的却要掩饰真诚”,^{[2]310}这是“玩”的秘诀之一,即表面的去功利化。要想获得“玩”的资格,还想玩得转,就得凭一定的手段和手腕,“场面上的人”都擅长逢场作戏的表演,围绕某个核心人物形成一个不容小觑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看到《国画》中大多数的故事场景并不是在“官场”,而是大都发生在酒店或饭局上,政府机关只不过是一个过

度场景。比如小说写皮德求去考察裴大年的飞人制衣厂,表面上是为考察民营经济发展(从政绩角度看倒也不假),但收受赠礼以及与美女记者逍遥缠绵,或许才是考察的真实意图。这显示出,地方官僚实际上是将自己隐秘或公开的企图光明正大地编织进政治对经济的支配中去——公开的也是隐蔽的,隐蔽的又是公开的,无论是官对商的照应,还是商对官的馈赠,其实都有一套非常精致灵巧的程序,这正是“玩”的辩证法。用小说的原话,玩的游戏规则称之为“含蓄”：“含蓄差不多等于艺术,有领导艺术的领导往往是含蓄的。”^{[2]345}领导通过手势、言语等的程序化加密,形成了一套缜密的政治修辞术,含蓄既是下级溜须拍马的艺术,也是领导控制下属的艺术,重要的是双方对流于表面的含蓄都心领神会。

官场的含蓄,是权力高度形式化操演的表征,而这其实也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式主义的内在要求。在《国画》中,我们看到,权力的形式感是作家着重表现的一个重点。小说写朱怀镜几次接打电话的心理活动以及在酒局上的装腔作势,无不揭露出权力形式化运作的秘密。有次朱怀镜跟皮德求同坐一辆车,他上车的时候直接从车头绕过去,“但当他走过车头时,突然很不自然了,似乎自己处在聚光灯下。他猛然意识到自己一紧张,就犯了个礼节错误。按规矩,他应从车尾绕过去,而不是从车头。”^{[2]163}因为,用小说的原话,“官场里,人人都得按自己的职务、地位、身份,谨慎地守着这些规矩,不敢轻易出格半步。事实上没有哪个文件规定了这些规矩,可它却比法律条文定了的还要根深蒂固。”^{[2]154}公权力的运作,本该是阳光下公开透明的,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出的经济政治却不然。权力的形式感,通过权力的日常生活化,渗入到了生活中的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中去。皮德求跟朱怀镜说:“为官之道,贵在用忍”,^{[2]483}“用忍”所表达的跟“含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因为经济政治,说到底并不具有政治的合法性,所以用忍也好,含蓄也罢,最终无不是为了掩饰权力寻租的肮脏勾当,完成由政治而经济的暗度陈仓。

在《国画》中,王跃文的难题在于,如果官场的种种隐蔽伎俩在小说中不予详细解说,而代之以间接的“反讽”表现,或以春秋笔法写微言大义,那么所谓的“为官之道”便很难得以清晰展现;而如果对官场见闻予以详细说明,个中细节大费笔墨,则又难免“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给人“以合时人嗜好”的印象观感。^[12]因此,从某种意义上

上说,只有在充分理解了王跃文的这种两难处境,我们才能真正进入《国画》的艺术世界。

在官场,权力的威严表面上显得温情脉脉,但这种含蓄或用忍终究是形式化的,一旦涉及实质性利益,形式的内容意图便显露无疑。所谓经济的政治,是指公权力的运用遵循的不是公开、公正、公平的政治原则,而是市场交易的经济原则,在《国画》中则体现为地方官僚如何地中饱私囊。官场上的上下级关系,实为一种出于利益考虑的“算计”。朱怀镜为快速升迁,人情往来只是表面功夫,实际都得以“送礼”为前提。朱送给皮德求的那副李明溪创作的价值28万的“国画”,皮德求轻松笑纳,对于画的价值,皮其实是心知肚明。小说写皮德求去乌县视察洪灾灾情,批给乌县一些救灾物资,但即使是市长的批示,下级单位也得“拜码头”才能将市长的承诺兑现,也就是说官场的行政指令,必须通过经济环节才能最终发生效力。而小说中写到的乌县买官、要官现象,更是经济化的政治典型表征。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隐蔽互动形成了一个封闭结构,这一结构支配着社会几乎所有的资源。唯有进入或依附于这一结构,才有参与分享社会资源的可能。朱怀镜的发迹最初缘起于失业的四毛来荆都找工作,四毛原先在王老八那做小工,而乌县大大小小的建筑工程全被县长张天奇的弟弟张天雄垄断包揽了,所以才失业来荆都找朱怀镜夫妇帮忙。但当时有职无权的朱怀镜并没有能力给四毛安排工作,后来四毛找工作受骗而被打住院,才因祸得福,朱怀镜也才从此结识了宋达清、雷拂尘、梅玉琴等人。朱怀镜后来平步青云,四毛也跟着大发其财。小说写皮德求因病住院,他平日常去的那家理发店师傅得知消息后,经常买花去医院看望皮德求。而当大家知道市长常去这家理发店理发后,理发店的生意也变得异常红火。四毛和理发店师傅的例子,均再次印证了“经济”只有依靠“政治”才能有所起色。小说写朱怀镜当上财政局副局长之后,银杏园宾馆吴经理专门给他开了个豪华大套房,由政府买单,“这大套房三百八十块钱一天,一年就是十三万多。局里正副局长六位,一年就是八十多万。既然住在这里,免不了还要吃,有时还要招待客人,至少也得花一二十万。这么一算,光是局长们在这里吃饭睡觉,一年就得百把万”。^{[2]464}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这样的公款“促进消费”确实也带动了GDP的增长。在现实生活中,同样类似的还有所谓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虽然有劳民伤财之嫌,但客观上也对经济(提

供就业机会、消耗投资产能等)有一定贡献,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复杂的一面。

在《国画》中,女人与其说是作为男性的欲望对象而存在,不如说是作为一种隐秘的象征“资本”攀附于权力,或者说是权力渴望征服的对象。因为“政治”若毫不隐晦地直接支配“经济”并不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因此,女人便成了权力自我增值的一种替代性证明。仅因为女人问题,顶多有道德败坏之虞,而不存在任何政治风险。小说写朱怀镜把雷拂尘出事被抓的消息告诉梅玉琴,梅很吃惊地问是什么事情,朱回答说:“这年头还能有什么问题?没有政治问题,女人不成问题,只有经济问题。”^{[2]458}这说明朱怀镜其实深谙此道。我们看到,“组织”对女人问题容忍默认,同样也是权力圈子内部含蓄的潜规则。在《国画》中,皮德求与女记者陈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以及柳秘书长外头包养情人,在机关其实是公开的秘密,但小说表现得非常隐晦。朱怀镜跟梅玉琴的关系,朱怀镜自以为没有外人知道,事实上在圈子里尽人皆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艺术在于,它从形式上将经济变成了最大的政治,而真正的政治,即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则通过“社会主义”的概念装置以及“市场经济”的叙事掩护自行藏匿起来。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是“国家(政党)”“社会”“市场”三重逻辑的交织缠绕,也正是从这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限度地呈现了“中国”的现实。通过“市场经济”的强有力叙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建构起一套非常精致而隐蔽的形式主义,即以经济外衣来包裹政治内核,从而达成“社会主义”的目的遗忘。也正是因为有政治的目的行驱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主义才能强大到支配起整个社会运行逻辑的程度。就当代文学而言,由80年代中后期建构起的文学形式主义趣味,到了90年代,已由作家转移到了文学批评研究界,形成了所谓“学院”的专业领域,而这恰好也暗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主义叙事诉求,或者说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形式主义,也参与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主义加密过程中来,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广受大众读者欢迎的小说,会遭到学院派的冷眼。因为《国画》提供的经验刚好与之相反:小说对权力形式的表现揭示,恰恰是反形式主义的,是一种植根于故事内容的现实主义。通过王跃文的解说,官场上心照不宣的含蓄、不动声色的微妙、权术的精致化运作等,淋漓尽致地显影了出来。

当然,作家此意并不是为满足读者猎奇的心理,而是要把官场的“含蓄”表现出来,不得不把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形诸文字——从小说的表现手法来看,《国画》确实并无太多新颖之处,但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作家的夫子自道:“我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我写的那些东西不仅仅是写官场,我写的还是现实和社会生态。官场小说说法太狭窄了。真诚地思考,真诚地写作,这是我的创作态度。”^[13]

本文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生成构造的角度进入小说,意在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结构,实际支配生成了《国画》小说的框架结构,或者说《国画》恰好共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结构。换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国画》所真实深刻反映的那个外部“社会现实”,也是小说的内部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场小说”无疑削减并遮蔽了《国画》的丰富性。一言以蔽之,《国画》的“真实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只有从小说完美隐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镜像的层面才能得以真正回答。当然,此说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就足以能解释小说全部的复杂性。客观而言,小说呈现的官场权术的精致而隐蔽的运作以及经济对政治的隐秘支援,跟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也不无联系,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恰恰为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一面提供了合法的容身之地,二者之间恰好也形成了一种隐秘的互动——这或许也正是以“官场小说”来命名《国画》部分合理的地方。

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算起,历经6年左右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开始就刻意掩藏的内在冲突开始逐渐凸显,而更紧迫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运行的矛盾后果成了时代发展的新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秉承经世致用湘楚文化精神的王跃文,是第一个以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敏锐回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种种历史后果的作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造矛盾的爆发,在知识界同样也有所反映:我们看到,跟《国画》的发表出版时间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那场著名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在这场争论中,“新左派”将吏治腐败归因为“市场经济”的推行;而自由主义者们则一口咬定,是“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反倒是“社会主

义”改革不足才导致种种社会问题的滋生。质言之,“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其实正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一次集中展演,但甚为微妙的是,官方对知识界的这场争论始终充耳不闻,不作任何表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国画》的畅销,倒是引起了官方某些人士的高度警觉。当然,个中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国画》在坊间引起的影响,大大超过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所波及的知识界。而有意思的是,《国画》的命运恰恰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式的:“出版后三个月内重印五次”,畅销热卖遵循的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而受到某些权威人士的诟病,“此后再也没有印行”,^{[2]497}则恰恰又是“社会主义”介入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刘起林. 官场小说的价值指向与王跃文的意义[J]. 南方文坛, 2012(2): 116.
- [2] 王跃文:《国画》[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
- [3] 吴敬琏. 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M]//吴敬琏. 吴敬琏改革论集.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43.
- [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5] 吴敬琏. 关于社会主义的再定义问题[M]//吴敬琏. 吴敬琏改革论集.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47.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1975—1977):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580.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1975—1977): 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1037.
- [8] 王梦奎. 王梦奎改革论集[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212.
- [9]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6.
- [10] 列奥·施特劳斯. 什么是政治哲学[M]. 李士祥,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 25.
- [11] 吴敬琏. 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M]//吴敬琏. 吴敬琏改革论集.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158.
- [12]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 鲁迅全集: 第9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91.
- [13] 熊育群. 雄风劲起 湘军再著风流[N]. 湖南日报, 2002-09-04(03).

责任编辑:黄声波